

『思想库』与国际关系

○ 袁明

本世纪初，受迅速发展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影响，在一些国力日趋强大的西方国家中，一批思想群体出现了。它们紧密跟踪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大事，广罗人才，广开言路，认真研究各类国际“热点”问题，对可能出现的危及本国利益的动向做出大胆的预测，提出常人所提不出的思想与建议。这些机构受到政界与企业界的普遍关注。就其功能而言，这类机构有一个统一的称号——“思想库”。

“思想库”起着谋士与智囊的作用。在传统中国政治中，“谋士”与“智囊”是为各级统治人物献计献策的，甚至直接参与治国定邦。“公子门下，食客三千”，形容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养士”的盛况。当然，历史时代不同，经济基础不同，政治文化传统不同，不能以古代中国谋士与智囊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去解释当代西方“思想库”的作用。从这一层面上看，东西方文化的确有不同之处。但相同点亦是有的，即要处理极其复杂的“军国大事”，是需要眼光、知识、智慧与思想的。

巴黎和会上诞

生一对孪生姐妹

现代“思想库”源于西方。这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与大国企图在国际关系中占尽主动密切相关，与有关国家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团成员曾在一起起草了一份决议：“与会者致力于建立一个研究所，起名为‘国际事务研究所’，1919年建立于巴黎。”该研究所开始时设了两个分部，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决议称：“该研究所的目的应该是使成员与国际局势保持联系，并研究国家政策和整个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决议的起草者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一场国际灾难起源于无知。人们应当吸取历史教训，让无知属于过去，贤明属于现在。

巴黎和会上的协议产生的两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在整个20世纪的国际政治中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建立在英国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称“查塔姆大楼”(Chatham House)。设立在美

国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它隔着大西洋的孪生姐妹。这两个机构开了西方国际问题研究和发挥“思想库”功能的先风。它们的机关刊物《国务事务》和《外交》季刊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国际问题研究的权威性刊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乔治·凯南以X先生的名义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有关于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文章已被载入冷战史册，几乎与“杜鲁门主义”、邱吉尔的“富尔敦演说”齐名，成为美国在冷战阶段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冷战结束，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此文的背景与作用虽然不能与X先生的文章相提并论，但是亦点到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深刻主题。“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一阵“全球效应”，至今余音未绝。

在国际政治中得到定位

冷战期间，面对紧张的军备竞赛，一批国际战略研究机构纷纷在西方建立。如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美国的“兰德公司”等都以能向西方最高决策当局提供一流信息和研究报告而享有威名。正因为它们往往可以对最高决策施加影响，它们亦受到同伴、对手和敌方的高度重视。这些被其服务方面与反对方都关注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政策的实践中得到了定位。这就是它们的权威性。

在美国发展最快

“思想库”在美国发展最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其实力，罗致人才，为美国在全球的扩张及与苏联对抗献计献

策。在此大气候下,一大批或官方或民间或介于两者之间的大小规模不等的研究国际问题的“思想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他有的“思想库”虽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但在战后新形势下,又扩充与加强了国际问题研究部分。这些“思想库”虽各自标榜具有“保守派”或“自由派”的色彩,所操,并通过一种叫做“数据兼容调制解调器”的装置实现各军兵种和武器系统之间信息的互通,进而提高对战场情况的反应速度,大大加快部队行动节奏,有利于在战场上取得主动。

美军数字化部队建设及其首次亮相,引起了各国舆论和军界的极大关注。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指出,“美军正在试验数字化部队的行动表明,美国陆军正在寻找一种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伤亡代价来打赢21世纪战争的作战方式”。参加“沙漠铁锤”演习的美国军界人士深有感触地说:“数字化部队拥有三倍于常规部队的潜在战斗力。”

随着主要武器装备的数字化,美国陆军部队计划分期实现数字化。1996年建成一个数字化旅,1997年建成一个数字化师,1998年再建一个数字化师,1999年建成一个数字化军,到2010年,美国陆军部队全部实现数字化。

数字化战场

美国陆军战场数字化专项计划办公室副主任小法伊弗指出,建设数字化战场的目的是实现所有作战职能领域通信的一体化,以便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提供正确的信息。数字化战场是以争夺数字化信息为主要内容,

以C₃I(Command指挥,Control控制,Communication通讯,Intelligence情报)系统为打击目标的新的作战领域,它具有一些新特征:

战场空间扩大,兵力密度减小 由于各作战平台之间以数字化技术相互联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武器打击精度、部队的反应能力及机动速度,从而扩展了战场空间。同时,由于整个武器系统毁伤力提高,部队配置将更加分散。据统计,每平方公里的兵力,古代战争为1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404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36人,海湾战争为2.34人。信息时代使兵力的分散程度将进一步扩大。

C₃I系统成为首要打击目标

在数字化战场上,敌对双方打击的首要目标是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对敌方的信息系统进行干扰、压制、迷惑、破坏和误导,同时对己方的信息系统进行防护和伪装。

战场整体性加强 对信息的争夺将全方位、全天候同时展开,无前方后方之分,战线更加模糊不清。

伴随科技革命而来

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革命在战场上的体现。作战部队将最充分地利用战场上的信息,加快战斗行动的速度。在战场上,“时间就是胜利”,“信息就是胜利”。数字化将给军事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决策与执行速度加快 数字化的战场情况可在瞬间传递给各级指挥官。过去需要几小时或几

十小时才能做完的事,现在只需要几分钟。作战进程大大加快,与决策接近同步。

武器装备反应速度加快 数字化通信系统能随时告诉你身在何处,帮助你判断敌人目标位置,提高了战场反应速度和生存能力。

作战识别能力提高 数字化技术将使参战全体共享战场信息,并再现真实战场上敌我双方的确切位置,使己方每一作战单元明了战场敌我态势,确保任何战斗行动是攻击对方,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误伤。

作战单元精确打击能力提高

在数字化的战场上,拥有数字化装备的作战单元在任何时刻都能知道自己在战场上的位置,战场透明度大为增强,这时只要找到对方目标(用精确制导武器瞄准并予以打击),几乎就等于摧毁了它。

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增强 在21世纪的战场上,由于作战空间的扩大,作战部队的分散程度加大,需要对分散在各方向、各地域作战部队的行动加以协调控制,以形成整体作战的威力。数字化装备以情报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一体化满足了这一需求。它将战场上情报侦察、通信、指挥和控制连接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尽管美国提出的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建设还处在构想、试验阶段,而且数字化手段也不是万能的,但这一战略动向预示着军事领域将掀起一场新革命,这对世界各国军队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摘自《世界知识》1995年第9期)